

“新启蒙”¹与超越现代性

——兼论二重性背景下的视角转换

冯定星

【摘要】“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大争论引起了社会学理论内部建构的紧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无法弥合长期横亘的二元对立，也无法解释当代的社会现实。本文试图用“新启蒙”来界定，并通过反思的、叙事的和修辞的视角转换，构建社会学的认知和表征模式，超越现代性。

【关键词】新启蒙 现代性 视角转换 二重性

—

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对现代性作思考、辩护并不断张扬其文化实践的历史。启蒙时代的培根、笛卡尔和洛克可以看作是“现代性规划”（modernity project）²的设计师，他们大力倡导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对自然地支配（掠夺性的实现主义）、方法的首要性（方法论的普遍主义）和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意义含混的个人主义）³，从而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自社会学创立开始，不管它愿意与否，早期社会学家就认为以追求秩序和控制、相信进步和完美为特征的理性（不仅仅是科技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乃至整个学科领域，不论后继者、批判者还是普通民众，都认为确实如此。

诞生于18世纪的现代性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它坚信日益增进的理性有利于加强秩序与控制，而且也有利于张扬社会正义、推进道德进步、促进人类解放和幸福。在工业革命的蒸汽鸣笛和新大陆发现的狂欢后，西方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大屠杀、失业、核威胁、金融风暴等一系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人们发现这些利益承诺并未落实，相反，隐隐还有退步的威胁。阿多尔诺（T.W.Adorno）就曾说过：“奥斯维新之后，诗已不存在”（Nach Auschwitz gibt es keine Gedichte mehr）⁴，以此表达对现代性鸣声悲切的分量，进而引发现代性的思考和争论，在这场旷时日久的大争辩中，哈贝马斯（J.Habermans）以启蒙计划来界定现代性，认为虽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仍坚信“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吉登斯（A.Giddens）与贝克（U.Beck）在《自反性现代性》一书中明确指出跨越时间历史并在世界范围空间内延展的现代性“没有被超越，只不过生活在它的一个更高更激进的阶段上”，不要奢谈什么“后现代”，我们只不过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现代性高度发达的“现代晚期”；跟吉登斯和贝克等人一样，弗朗斯（J.Fornas）主张我们正在进入的只不过是一个与前一阶

¹ 关于“新启蒙”的提法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全盘西化，主要见之于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冠之以“启蒙”还加上“新”以迷惑民众；另一种是在思想和学术上批驳“后现代性”的思想主张，也有的叫“后启蒙”，可以参见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一文。本文的“新启蒙”立意取之于后一种。

² 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笛卡尔的《方法谈》（1637）和洛克的《政治论下篇》（1690）可以视为现代性的三个奠基性文件。

³ 张小山、黎民.西方社会学理论[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p.198。

⁴ 阿多尔诺、霍克海姆著，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p.253

段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晚期现代性”时期；鲍曼（Z.Bauman）也用“流动的现性”来诠释和评注现代性。

相反，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拒绝任何类似的标签，比如福柯）却极力主张用“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诸如此类的还有 Smart、利奥塔和罗斯诺等人。尤其是利奥塔指出“后现代性就是‘异质性’的语言游戏不断形成、瓦解和重组的游戏规则，它追求的是创新、差异和多样性”⁵，让人不免觉得后现代性的反整体化及注重偶然、边缘和局部的倾向。

可以这样说，后现代性由于鼓吹多元化和多视角主义，建构“地方性”，披借多元化的外衣已经充斥于整个时代的话语和解释中，无处不在。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后现代的话语频频出现在文化、艺术、甚至科技等诸多领域，不管是民众还是知识分子，都在心理上有一种“后现代性（已经或即将）终结现代性”的倾向。在我看来，任何把与现代性社会学相悖的理论都冠之以“后”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这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首先从认知层面看，这种做法只能确定我们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概念了。⁶或者用卢曼的说法，它们只是“表明当代社会失去了对于自我描述的正确性的信念”⁷。归根到底，这种“后现代”表述，其实还是继续着“在现代性中纠缠”。“历史的终结”或“最后一个人”的论调，不过是末世论（eschatology）的翻版，最终迎回的还是黑格尔的宏大叙事。其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现代性已经被超越或者即将被超越，现代性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它的历史生命周期还没有走到尽头；或者退一步来讲，即便是突破现代性的种种铁笼和限制，是否必然进入到与之有关联的“后现代性”分期还未成定数，我们也不一定非得接受“后现代性”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思想的历史车轮是否会在当代发生转轨，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贸然将“后”的帽子挂在“现代性”之前只能表明理论认知的肤浅和盲目一窝蜂的心态。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走出我们原有的框架，但走向何方？我们越来越自觉的意识到，这并不是可以预先确定答案的问题。

二

鉴于“后现代”一词日渐泛滥，而且也被证明是一个不恰当的历史分期——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我们已经处在“后现代之后”——以后，如何来总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学术思想？我觉得或许可以用“新启蒙”来界定。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在众声喧哗、尘埃落定后，真正具有价值的，还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展开的现代性方案弊病的揭示和反思；另一方面这种批判性探索从根本来说也是承接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⁸，只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彻底的精神来落实，并能以启蒙的态度来对待启蒙本身。这种“反身性”（Reflexivity），或贝克所言的“自我对质”（self-confrontation）大概可以算是“新启蒙”最显著的特征。

不过，如若要甄别“新启蒙”的谱系怕不是一件易事，至少要将 19 世纪末期以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不冒太大的风险，我们可以说，尼采矗立在新启蒙的源头，

⁵ 利奥塔、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p.141。

⁶ 贝克、威尔姆斯著，路国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p.16-17。

⁷ 卢曼著，刘锋、李秋零译.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9。

⁸ 汉密尔顿罗列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所普遍认可的十大理念：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普遍主义、进步、个体主义、宽容、自由、人性的一致性、世俗主义等。Hamilton, Peter 1992,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in *Formation of Modern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Polity Press.p21-22.

而福柯则是新启蒙的旗手。在经典社会学中，韦伯和齐美尔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不仅体现于他们对理性化后果的深入探究⁹，也体现在他们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念、生命的追问、人生意义的追求等划出科学领域，认为“价值观念的诸神之争”并非科学所能及。¹⁰平心而论，学科化、学院化和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对新启蒙贡献不大，反倒是当代的欧洲社会学家虽不无分歧，却对新启蒙的视野贡献了不少洞见。

启蒙运动后的思想家们包括现代的诸多学者用现代性（或现代化）来概括总结启蒙以来的思想和学术，是没有意识到启蒙的“内容”或“动力”并不等同于其“形式”或“逻辑”，启蒙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特质、一种态度。就如哈贝马斯所言，西方理性化的发展只是偶因的特质符合理性的特质，理性并非一定要按照“已然”来发展，它本来还有其他发展的可能；同样现代性也是如此，或者说这也就是现代性的症结所在。知识分子不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而是充当起阐释者，建构起一个“现代性”来统领启蒙以降的社会特征，还使用种种话语霸权为这种说法提供合法性的鼓吹，并通过具体发展来论证其合法性，这本身就是存在逻辑问题的，也是不符合学术伦理的。启蒙及其开启的所谓“现代性”，其根本要素并非某种我们必须死死抱住不放的“理性的本质内核”，或者意味着芜杂暧昧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囊括了社会发展的后果和前进的动力。

鉴于此，用“新启蒙”的措辞来概括、描述当前的主导性思想潮流是恰当的，虽然带有重建的意味或是一种选择性的强调。在我看来，尽管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更不存在人人认可的所谓共识，但在对多元性的强调和对异质性的尊重下，围绕“新启蒙”我们还是可以走到一起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期达成沟通的共识，以更好地理解 and 整合当代诸多思想巨擘的开创性工作。

沿着“新启蒙”的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先以嘲弄启蒙以来成就为能事的福柯，后来又重新回到起点，接着康德往下问：“什么是启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与康德类似的答案：我们今天是否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不，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可以这样说，启蒙是一个进行时，而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成时或过去时，它就如吉登斯笔下反思性的行动“流”，是一种动态、流动的特质，在历史长河中始终能有新的表现形态和意义，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新的阶段¹¹，而没有断裂¹²。这一点也是吉登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形成的分析让人觉得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所在。按照这种说法，现代社会学包括当代和所谓的“后现代”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启蒙的“流变”，只是启蒙的特质有了新的发展。

三

社会世界¹³是如何存在的？我们怎样认识和理解社会世界？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一

⁹ 韦伯关于理性与现代性的探讨主要参见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4-191页；齐美尔从文化危机和货币对人的异化角度阐发对理性化的担忧，参见文军.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p.76。

¹⁰ 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定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158。

¹¹ 这里的阶段不是通常意义上历史的分期，而是指启蒙的绵延是不间断的过程，只有在对已经历过的意义和形态的绵延给予话语层次上的关注时，才会出现所谓的“启蒙”和“新启蒙”的区分；而且不能脱离历史时空和身体、思想传承讨论，因为它们都是启蒙与周遭世界的中介，是启蒙中的自我统合体。

¹² 吉登斯认为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的资本主义，不是“以往”各个社会类型中发展而来的高级进化形式，而是西方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共同作用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

¹³ “社会世界”不同于哈贝马斯在沟通行动中研究法律道德的世界领域划分。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首先是“新启蒙”的认知对象，它不是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对象，而是与行动者一起构成的二重性存在；从认受

个回答的两个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演变到现代出现了新的形式，归结为一点就是二元对立，不管是主观和客观、行动与结构，还是个人与社会、建构与结构等等，直到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¹⁴出现。其实在吉登斯之前，布迪厄也探讨过二重性的问题，只是不曾正式提出，但在其关于场域和惯习的讨论中已有体现：“惯习和场域是历史的两种存在状态”¹⁵。可以说正是二重性提供的单个现象的两个面相观使得二元对立的紧张矛盾得以缓解。

布迪厄的二重性，一方面用于解释实践，另一方面则指对社会世界的理解。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更具有根本性。二重性的存在，与布迪厄所谓的“结构性同源”和“本体论整合”概念处于同一个层次。可以说，“结构性同源”和“本体论整合”是二重性存在的根源。而信念关系以及同谋状态，都可以在这一二重性中找到理解的根据。

那么这种二重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识到社会世界的二重性，只是开启了问题，却没有深入问题。问题还在于这种二重性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状态”（doxa）的产生，以及基于“信念状态”的象征性社会秩序的产生。或者说，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为此而显现出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谈二重性和二元对立的区分了。传统理论家特别是现代社会学家通常站在主客对立、结构与行动对立的立场，借助现代主义理解，确信社会学及其理论的表现主义性质¹⁶和基础主义性质¹⁷，用“镜喻”“树喻”的现代主义理论观来描述和分析他们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可以说这种做法从一开始立论就存在问题了：如果将作为研究对象且包含研究者自身在内的社会世界放到人的对立面来分析，那么人居于什么位置？如果将社会世界作为与研究一体存在，那么这种主客二元的对立是否还具有正当性？

由此观之，二元论的对立预设是自我毁灭的原因。那么用二重性来替代是否可以化解这种合法性危机呢？二重性不是一种研究技术，甚至连一种认知方法都算不上，它所体现的关系论思维，姑且只能算是一种研究视角，而且这种视角并不能决定研究者的宇宙观和研究的模式，它仅仅是一种对学科“科学敏感性”的觉知。由此出发，借助于科学的技术和研究层次，足够开展社会研究和构建新的社会学。那么在二重性背景下，社会学在自己的认知和表征模式上，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呢？或者说，社会学中出现了怎样的视角转换以及如何重新给自己定位呢？

首先是反思性的转向。反思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人类言语的一个根本维度。在一个“歧议的异质化”（heterogeneity of dissension）受到极端推崇的时代，这种转向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笼统的看，“反思转向”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科学在面对所谓“后现代”思潮与现实的挑战，在原有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受到致命性冲击后，重新进行的战略部署，以寻求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努力。从根本上说，这是在新的情况下为自己“安身立命”。

特性上看，它也不只是真理性和必然性的集合，它也包含有价值判断、伦理选择等自由性和正当性的选择。

¹⁴ 结构二重性，是指结构作为自身反复不断组织起来的行为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的卷入生产与再生产。

¹⁵ 布迪厄、华康德著，李康、李猛译.实践与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p.183。

¹⁶ 表现主义性质认为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将理论发展理解为通过修正错误而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社会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增添新内容，进行整合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必经步骤。理论的进步遵循黑格尔所描述的“正—反—合”的逻辑程式曲折展开。

¹⁷ 基础主义性质，认为其任务是为社会学其他领域提供一套概括性、一般性或总体性的概念和命题系统，指示普遍社会逻辑指导工作。

率先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古尔德纳认为“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超越现有的社会学……社会学家必须获得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像我们审视他人所持的信念那样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念”¹⁸。当代社会学的反思主要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贝克用两种现代化指出科学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源泉，更是问题的根源，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垄断地位的挑战，用“社会思维”破除技术思维的方法，将社会实践从科学中解放出来。布迪厄则从社会学过程如何体现反思性出发，提出“社会学的社会学”，并指出“反思就是不断将社会科学的武器转向自身，以更好的控制和消除在对象的建构中导致的扭曲”¹⁹。这种将“他者”对象化，将对象化眼光本身对象化的做法，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又将社会学神秘化了。

不难看出，逻辑上不断地反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的危机，试图洞察一切的全能视角设想，既不具有抽象的可能性，也不具有现实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反思”、而是将反思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美德呢？显然这又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真是上下求索，左右为难。佩尔斯指出“现实与说明之间具有一种交互构成性，适当的反思是可行而且重要的”²⁰，因为这比非反思更能保证认识论的健康。那么为了防止反思的恶性循环，我们是否可以“只进一步”？亦即放弃以上两种相互矛盾的寻求确信的努力，只是增加一层自我指涉，以展示叙述的解释出发点和回归点。通过这种“展示的政治”²¹，将直线性的故事，连接成椭圆形或曲线性的故事。

其次一点是叙事的转向。叙事是人类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正是这种方法，却是现当代社会学家极为诟病的，他们反对任何的宏大叙事，认为其日益自我指涉，只是不断在没有逻辑论证的故事框框中打转，根本无法把握时代冲突和公共争论，更遑论实践介入和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构建，在理解、阐释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研究者的思维，所使用的语言也都有语法的、叙事的和修辞的结构，它们创造价值、赋予意义，并构成了研究过程中出现得主体和客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叙事无处不在。那种忽略叙事的存在或者将逻辑—科学范式²²奉为圭臬而将叙事性认知弃之不用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和缺乏学术公正的。诗歌、戏剧和故事性的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它也是一种认知方式，通过探究事件间的特殊联系，能够呈现清晰的思想 and 知识，“透露人类体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²³。

长期以来，社会学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关注的是如何认识真理的认识论问题，而其实对于人生来说，更为实际和迫切的，是我们如何赋予体验以意义的问题。社会科学自确立之日起，也投身于发现社会真理，但结果却离我们的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甚至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其中有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叙事性认知的提出，可

¹⁸ Goulder, Alvin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p.489.

¹⁹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77.

²⁰ Pels, Dick 2000, “Reflexivity: one step up”,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17(3): p.1~25.

²¹ “展示的政治”是指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不断展现微观权力如何在知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通过不断地曝光展示，让民众认清权力的本来面目，自己做出选择而不用知识分子告知。

²² 西方传统将自古希腊以来知识和真理的传播方式分为科学的（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和文学的（叙事性认知）两类，前者寻求的是普遍的真理条件，后者探究的是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

²³ Stephenson, Susan 2000, “Narrativ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ast*, edited by 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li & Frank Webs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p.112.

谓是为我们提供了契机。

最后一点是修饰的转向。修辞学的源头是“说服的技巧”或“演说的艺术”。自 17 世纪科学大行其道时，修辞便作为一种文学性的措辞布局艺术被科学排斥、被狭窄化和边缘化，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真理的纯粹客观性，真理凭借其内在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同表达真理的语言无关。这一点决定了“旧修辞学”的看法：修辞是一种是真理更加有效的手段，或者是“加到真理上的一种冲动”。

司各特和约翰斯顿（Henry Johnstone）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真理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那么在人类的事务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它是认知性的”，“发现真理和传播真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²⁴。以这种新修辞学的观点看来，真理不过是共同分享的确定性或者知识。那么这种确定性或肯定从何而来？我认为应该是从修辞交流中的执著追求而派生出来，也就是通过辩论和交流，使不同的思想碰撞和并列，再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这种将个人选择性的经验进行公开辩论和反思的思想，能够得到互为主体的证实，从而创造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辞成为与科学和辩证并列的认识方式。

现代社会学或者更宽泛的说是现代性社会学都竭力排斥文学和修辞成分，以维护实证性和科学性，殊不知在社会想象和定量研究中，它也是在使用着自己特定的所谓“科学”的修辞方法，追求一种“没有风格的风格”。其一表现在隐喻和社会想象方面，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有过“用隐喻占有陌生印象”²⁵的做法：孔德和斯宾塞都曾以生物学为原型构筑自己的社会学体系，还有戈夫曼的舞台隐喻、韦伯的铁笼隐喻、滕尼斯的机器隐喻，包括近来“空间隐喻”²⁶的新趋势，都可以说是用一种经验理解和说明另一种经验。尽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号称是实证的，避免价值判断，但是实际上这种隐喻的社会想象又将评价性判断迎回到社会学中。其二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质疑。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场域，漂亮的统计检验，已经成为研究者炫耀自己精湛技艺的手段。从根本说，数字也是一种修辞，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甚至是一种维护专家身份的策略。事实上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大异质性，可被数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味追求数字的精确性，如果不是“利用统计来说谎”，那就是纯粹出于科学修辞的需要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修辞的视角不可能从社会学中抹去，尤其是在二重性的背景下，更好的理解主体间性和形成普遍的沟通共识是极为有用的。修辞学转向，无疑是对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大反动，唯有以修辞为一种视角，我们才可以看出原先被遮蔽的东西，重新理解我们许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发现科学活动的复杂性。

²⁴ Bogard, William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Myths of our Tim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21.

²⁵ 尼采著，田立年译. 哲学与真理[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76。

²⁶ 空间隐喻在社会学中由来已久，如齐美尔的“社会几何学”就曾借用不少空间范畴来刻画社会关系，包括当代布迪厄的“场域”分析和怀特的社会网络分析都是空间隐喻的突出表现。

【参考文献】

- [1] 张小山、黎民.西方社会学理论[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 [2] 成伯清.走出现代性: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3] 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 张宝明.“新启蒙”与“后启蒙”: 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J].江海学刊, 2003(4)。
- [5] 成伯清.新启蒙运动?——当代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J].社会学研究, 2006(1)。
- [6] 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 [7]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8] 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M].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M].台湾: 三民书局, 2000。
- [10]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 [11] 卢晖临.《叙述的复兴: 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理论演进》, 来自社会学理论译丛(第一辑)[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李林艳.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J].社会学研究, vol.3。

作者简介: 冯定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学系 07 级本科生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